

「中國人」與「香港人」

從《中國學生周報》

分析 1960-1970 年代香港青年人
身份認同意識的轉變思潮

Chinese and Hongkonger

An Analysis of the Changing Trend of the
Identity Consciousness of Hong Kong Youth
from the 1960s to 1970s

by the *Chinese Student Weekly*

香港社會科學學報
第五十六期 2020 年秋/冬季
Hong Ko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No. 56 Autumn/Winter 2020

龐浩賢*

Ho Ying PONG

摘要

進入 1960-1970 年代，香港的新一代年輕人的身份認同取向出現了重大的轉變，在港、中兩地政治和社會動盪不安的局勢影響之下，香港青年人由以往認同中國人的身份，漸漸改變為認同香港人的身份意識。本文將會透過《中國學生周報》這本當代流行的青年刊物，來分析這一段時期香港的青年人如何

* 龐浩賢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哲學碩士

本稿原文為筆者的碩士學位論文〈負起時代責任：《中國學生周報》與「文化中國」在香港之建構〉的部分章節，後經業師黃文江教授的建議及指導修改而成，又得到《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的編輯們協助校正行文，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20 年 7 月 17 日；通過日期：2020 年 9 月 28 日。

認識和論述自身的身份認同取向。本文總括了三項當代青年人身份認同取向劇變的主要原因，包括「鄉土意識的流失」、「香港認同的出現」和「兩個中國的衝突」。這些因素不但導致1960-1970年代香港青年人認同香港人的身份，更導致《中國學生周報》在1970年代中期倒閉停刊。

關鍵詞

中國人、《中國學生周報》、身份認同、香港人、香港 1960-1970 年代

Abstract

The ident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Hong Kong youth underwent a major change in the 1960s and 1970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urmoil in Hong Kong and China, Hong Kong youth identified themselves as Chinese. The identity of Hong Kong people gradually changed into identity consciousness. This article will analyse how contemporary youth in Hong Kong recognise and discuss their identity orient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Student Weekly*, a popular contemporary youth publication. This article summarises three main reasons for the drastic changes in the identity orientation of contemporary youth, including “the loss of local consciousness”, “the emergence of Hong Kong identity”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Chinas”. These factors caused Hong Kong youth to recognise the identity of Hong Kong people from 1960 to 1970 and led to the closure of the *Chinese Student Weekly* in the mid-1970s.

Keywords

Chinese Identity, *Chinese Student Weekly*, Hong Kong Identity, Hong Kong in 1960-1970s, Identity

一 青年身份認同取向的歷史背景

《中國學生周報》(以下簡稱為《周報》)(1952-1974)由友聯研究所於1952年創辦，首任社長余德寬，總編輯為余英時；並於1954年推出「新馬版」(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地區)的《中國學生周報》(後改名為《學報》)(1954-1986)。透過仔細閱讀由余英時先生所撰寫的《周報》創刊詞，便能理解到《周報》的創辦目的正是為「中國而立」，該文指「為海內外全體中國學生而服務，在這裏，我們可以暢所欲言，以獨立自主的姿態，討論我們的一切問題，從娛樂到藝術，從學識到文化，從思想到生活，都是我們研究和寫作的對象。替未來的中國拉索出一條正確的出路來！」(余英時，1952年7月25日，第1期第1版)傅葆石則形容《周報》編輯們的「工作目標」就是「試圖把《周報》打造成淡化政治色彩的文化啟蒙媒介，聯合世界各地的華人青年，凝聚成一股重塑中國的力量。」(傅葆石，2019年8月：頁67)故此，《周報》營運的核心目標正正就是給予包括香港在內的海外華人青年就當代中國發展問題交流及貢獻的平台，為未來復興中國探索可行的方法(香港出版學會編著，2018：頁184)。

《周報》的母公司友聯研究所則大約於1949至1950年之間由一群南來學者所成立，負責研究、出版關於中國大陸當代政治發展的雜誌及書籍。而友聯研究所的財政來源主要依靠由美國中央情報局成立的「亞洲基金會」(The Asia Foundation)¹的資

1 當時亞洲基金會除了資助友聯研究所外，還透過駐港的美國新聞處資助翻譯反共文學的項目，以及贊助一些華人作家出版小說或散文集。而這些文學作品中往往都蘊含着反共的政治意識形態，包括張愛玲的《秧歌》(1955)、《赤地之戀》(1953)等等，顯示美國的官方勢力透過資助「反共文學」作品出版作為對抗中共的「文化冷戰」戰略。參考單德興(2013)：《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載彭小妍編：《文化翻譯與文本脈絡：晚明以降的中國、日本與西方》，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頁167-168。

助，該會前稱為「自由亞洲協會」(Committee for Free Asia)，創立目的為「應付美國和東方集團在冷戰中互相對抗的局面」，善用香港這個有着重大戰略價值的地方以收集及推廣反共資訊。² 曾任《周報》總編輯的余英時評價友聯的出版刊物時，指出友聯的出版刊物對當代香港社會文化特別是對青年思想有重大貢獻，他形容友聯的出版刊物「對青年人(大、中學生)的價值觀念產生了一代的啓蒙作用。通過相關的刊物，友聯深入淺出地把中國重視人文的觀念如仁義禮智信和現代普世價值如民主、自由人權等傳佈到青年學生的心中，並且長期不斷地進行下去，其效果是難以估量。」(余英時，2018：頁 140)

早期的《周報》強調傳承傳統中國文化，刊登不少介紹傳統中國文化、歷史、語言等知識的文章。誠如盧瑋鑾(1939-)的分析，1960年代中期前後是《周報》編輯方針的「分水嶺」，她指「六十年代中葉以前，它的主要精神乃在發揚中華文化，闡釋民族大義」(盧瑋鑾，1996：頁 50)。而論及中國文化的欄目包括「歷史故事」，內容介紹一些中國歷史小故事；專欄「成語講座」則介紹中國的四字成語。

另外，何振亞在受訪時提及 1960 年代《周報》內部曾出現所謂「文化派」及「企業派」的爭議，即是堅持《周報》以宣揚文化價值或改為迎合市場的商業思維作為《周報》營運方針的討論，最後並沒有得出甚麼結論，但顯示出《周報》內部已經洞悉改革刊物，迎合新時代以求生存的需要(盧瑋鑾、熊志琴，2016：頁 36)。

發展至 1960 年代中期，《周報》嘗試革新報刊意識的定

2 除了友聯研究所外，亞洲基金會還有資助「人人出版社」、「亞洲出版社」、「亞洲影業公司」等香港的反共文化機構。參考鄭樹森(2004)：〈東西冷戰、左右對壘、香港文學〉，載馮品佳主編：《通識人文十一講》，台北：麥田出版)，頁 166-167。

位，減少介紹、談論中國文化、政治，陳特形容當時期的《周報》所推行的是「香港化」、「多元化」路線（黃子程，1988年10月15日：頁126）。在欄目方面，開設「科學世界」教授科普知識，設立「譯林」一欄翻譯外國文學作品；又設立「詩之頁」介紹新詩體例和作品，以及「電影」欄目介紹西方電影如「新浪潮」系列等等。

但進入1970年代，《周報》的讀者人數及銷量持續不斷下跌，根據曾任《周報》編輯的吳平所提供的數據，1971年底《周報》的銷量已跌至不足一萬份（吳平，1988年10月15日：頁146），至1974年初第1115期開始起改為雙週報，但仍然未能維持收支平衡，至1974年7月第1128期宣佈「停刊」，合共出版1128期。

在香港社會大眾的身份認同取向方面，踏入1960年代中期，香港的青年社群在身份認同取向上出現了極大的轉變。由原本只視香港為一處「暫居地」或「避難所」，改變為視香港為「歸屬地」並對香港產生認同感，希望在香港「落地生根」。因為人的身份認同並不一定維持「從一而終」的狀態，而是可以不斷改變。霍爾（Hall，1932-2014）認為身份認同意識是流動而且可變的，他指出「身份認同是不斷建構、流動而不固定的，不同的人們及團體利用種族、文化、共同歷史及符號等日常生活元素持續更新及再定義身份認同」（Rutherford, 1990: p.256）。蔡榮芳則指出在歷史上，香港人的身份及國家認同意識並非如「鐵板一塊」、一成不變，而是隨着不同時期的政治和社會局勢的變遷而有所改變（蔡榮芳，2001：頁278）。蕭鳳霞亦有類似的看法，她形容中國人身份認同意識的涵義對於不同時期的香港民眾的身份認同取向，都產出了不同程度和意義上的影響，蕭鳳霞提醒中國人身份對於香港民眾而言並非「一套與生俱來的、固定的文化素質所組成的」，而是在「不同

的時間和空間透過談判和妥協而產生的」，故此中國人身份認同意識對於不同時期的香港社會呈現不同的意義和價值（吳俊雄、張志偉，2002：頁 705-713）。

在二戰結束後，香港民眾的身份認同意識正正就受到不同的政治社會因素所影響而不斷變動。陳明鈺（1949-2018）認為，由於英國在管治香港這個擁有着「不光彩歷史起源」的殖民地時欠缺統治的合法性，特別是在二戰後亞非地區牽起非殖民地化浪潮，港英欠缺統治香港的合法性的情況更為明顯，故此在 1950 年代「港英政府刻意系統化地迴避香港的國家歸屬問題，以及香港人的國民/公民身份認同及國籍的取向」，意圖淡化香港華人社群的「中國人」身份認同意識，藉此維持其英國的殖民統治（陳明鈺、鮑紹霖、麥勁生、區志堅合編，2018：頁 xxv）。而鄭宏泰、黃紹倫（1948-）則認為 1950 年代確立的香港身份證及回鄉證制度，促使獨立的「香港人」身份逐漸催生，加上中國大陸在 1950-1970 年代政局動盪，使香港華人減少與大陸社會接觸，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意識及本土社會文化便因此而獨立地發展出來（鄭宏泰、黃紹倫，2018：頁 248-249）。

無論如何，1960 年代中期至 1970 年代初的香港社會便進入身份認同取向改變的階段，由完全傾向認同中國漸漸改為對香港本土的認同，受到當時整體的社會環境所影響，正如冼玉儀（1948-）形容香港社會大眾的主流身份認同意識取向由開埠以來至 1950 年代的「過客心態」，過渡至 1960 年代的「本土意識的萌芽」，兩代香港人在身份認同上出現很大的「鴻溝」。她指：「至六、七十年代，那些在戰後香港出生、成長的年青一代開始與上一代之間有了一個很大的鴻溝。這不僅僅是代溝而是在一代與二代間，那思潮改變太大了。」（田邁修編，1995：頁 88-89）

在這種社會思潮之下，秉持推崇中國文化及中國人身份認同意識的《周報》當然面對很大的衝擊，如同《周報》長期讀者陳文鴻在檢討《周報》為何會被時代淘汰時作出的分析，他形容：

《周報》在友聯出版社的控制下，以及右派文人的心態主宰下，基本上不可能適應香港社會的巨大轉變。我們在香港長大的一輩年青人，不可能把自己封存於現代以外，停留在傳統中國文化，或者是傳統中國文化思潮階段。（陳文鴻，1988年10月15日：頁119）

《周報》亦因此逐漸失去年輕讀者的支持，並導致《周報》在1960年代中後期起銷量不斷下降。陸離在1971年初曾撰文向讀者求助「救亡」，她指：「還有，請順帶在有意無意之間，切實展開一個中國學生周報救亡運動。只要你看，你就買吧。如果每一個讀友都能做到這一點，學生周報就有救了！」（陸離，1971年1月15日：第965期第5版）雖然不少讀者支持「救亡《周報》」的號召（大孩子，1971年2月5日：第968期第9版），甚至提出「一人購買兩份」的呼籲（CHL，1971年2月12日：第969期第9版），但《周報》銷量仍然不斷下跌，最終被友聯出版社停止出版。

再者，在1960年代中後期起，不少讀者的投稿文章已經質疑《周報》所提倡的「中國本位」意識是否仍然切合當時香港社會的「時代需要」，讀者們認為《周報》所宣揚的文化及身份認同意識形態已經不合時宜，香港青年一代已經不能在《周報》裏找出共鳴之處，故此令《周報》讀者人數持續減少。

綜合分析《周報》所刊登相關文章的論述意識，亦可以了解到為何1960年代香港的新一代在身份認同取向上捨棄了中國身份，趨向香港認同的原因。第一，因為六十年代的香港青

年大多在香港出生，缺乏對中國大陸的鄉土情感，難以對中國產生認同。第二，1960年代中期起香港的社會、文化主體意識漸漸形成，增強了新一代年輕社群對其身份認同的意識。第三，中共及國民黨皆自稱為「中國政權」，「兩個中國」的出現令香港青年對中國認同無所適從。一直主導香港及海外主流「中國認同」的國民黨政權，自1960年代起散發着一股「反攻無望」的意識，令香港的支持者十分失望，故紛紛拋棄中國人身份認同；同時，中共治下的中國大陸在1960年代起國力及國際地位漸升，部分香港青年的中國人身份認同意識更轉為認同中共治下的中國大陸。本文將會詳細分析《周報》所刊登的文章裏，所呈現的1960-1970年代的香港青年，對身份認同轉向意識的原因及其變化。

二 鄉土意識的流失：逐漸模糊的中國人身份

進入1960年代中期，香港青年社群的身份認同意識出現了重大的改變，香港青年由普遍認同自己作為一個中國人，改變為認同自己是一個香港人。在這個劇變的背後，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戰後出生的新一代香港青年人缺乏在中國大陸生活的經驗及記憶，對中國的鄉土沒有任何的情感，因此難以維繫這一代人的中國人身份認同意識。根據呂大樂把戰後香港人按年齡界分為四代的理論，在戰後出生的這一代被歸屬為第二代，被稱為「戰後嬰兒潮」，呂大樂形容第二代與第一代香港人在認同上存在很大的差異，因為大部分第一代的香港人都是從中國大陸移居香港，而且「始料不及地」長居於香港，這一代人仍然「盼望有回鄉的一日」，他們的成長過程以中國鄉土（包括廣州、上海等地城市）為「中心」。但「戰後嬰兒潮」的一代卻是在香港土生土長，只能透過父母長輩的口中認識中

國鄉土，在缺乏第一身的接觸下，自然難以對中國產生共鳴感（呂大樂，2007：頁 15-18）。在《周報》裏，早期的文章經常出現「懷鄉」的主題，但逐漸地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充分反映了新一代香港人缺乏「鄉土中國」意識的文章。

在 1960 年代中期以前，幾乎所有刊登在《周報》上涉及身份認同取向問題的文章，作者們均自稱認同中國人身份的意識，身份認同取向在當時期的《周報》裏處於一個「毋庸置疑」的位置上。《周報》曾經刊登的一篇「學壇」（社論）文章便呼籲所有讀者「堂堂的做一個中國人」，該文認為「中國是每個中國人的中國。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主要還是中國有獨立的文化」，強調海外華人必須承擔起中國人身份認同的責任（學壇，1957 年 5 月 24 日：第 253 期第 2 版）。同時，不少作者投稿予《周報》，是為抒發他們懷鄉的情感。一篇以〈秋晚〉為題的文章，內文描述：「每當楓葉紅遍了原野，西風頻捲着窗布時，我總無意識地憑欄北望；想望見那破碎了的家。童年的往事，已不堪回首，溫暖美麗的故鄉，已成了冷酷、醜惡的世界，一切的一切，都給時光的洪流所淹沒了。」該文章描述紅葉遍地的景象令作者回想起中國大陸家鄉的情景，思鄉、懷鄉意識非常濃厚（若夢，1956 年 12 月 21 日：第 231 期第 3 版）。

再者，也有名為〈秋故鄉的憶念晚〉的文章，藉着記誦故鄉的人和事，表達作者盼望歸鄉的心情。該文作者抱怨道：

我底可愛的故鄉高州，雖然無甚名勝古蹟，亦不算山明水秀；然而它的印象卻深深的印在我腦海永遠不能磨滅。幾年前因為要離開故鄉，我特地到觀音山遊玩，帶着依依不捨的心情，臨風洒淚。可愛的故鄉！何時再能重回你的懷抱呢？（海竹，1958 年 1 月 24 日：第 288 期第 9 版）

這篇文章散發了作者對於再次回到中國大陸鄉間的期盼情緒。

更有作者透過回憶以往在中國大陸鄉間的生活片段，寄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夠回歸家鄉，該文作者形容「離別多年的家鄉，現在已經變成怎樣？但我相信我總有一天能再回到故鄉，同鄉們總有一天能再自由地愉快地過活，那一天不會太遠的」（堅貞，1958年5月23日：第305期第11版）。可見早期《周報》上刊登不少作者緬懷以往生活於中國鄉間的文章，並依靠回憶在中國大陸的生活片段作為疏導思鄉情感的途徑。

可是，當進入1960年代中後期以後，「懷鄉文章」在《周報》上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就是主題為作者對於中國鄉土生活進行幻想的文章。儘管這段時期《周報》上的大部分作者仍然傾向認同中國人身份，但這一代的年輕人並沒有在中國生活過的經驗，他們只能透過上一代人在中國大陸生活的回憶或書本知識來建構她們的「鄉土中國」意識。在這種情況下，新一代難以徹底地認同中國人身份。在1965年，《周報》刊登了一篇題為〈談鄉土感情之生根〉的文章，作者指出香港新一代青年缺乏對中國鄉土的生活經驗及其連帶的情感，只能依靠自己的幻想鄉土的情況以舒解心中的鬱悶，認為新一代青年難以再認同中國。年輕作者分析：

對鄉土的感情，是如此根深蒂固地植在我們上一輩的心。然而，生長在香港的中國的青少年，他們的鄉土感情並不來自土地，乃是來自空中。當他們沉浸在這種感情當中，他們必須運用想像，在空中建造起一塊美麗的土地；任何建築在想像中的感情，最後如果不能在現實中得到寄托，他們必須運用想像，在空中建造起一塊美麗的土地；根基可能是幾個隱約可辨的險孔，一道煙霧迷濛的溪流；更可能一無所有。

因此，該文作者認為香港新一代在欠缺親身生活在中國大陸的經驗之下，難以全面地認識中國，唯有透過老師在課堂上向學生們傳遞中國的地理及歷史知識，嘗試為香港新一代「建立對中華民族的愛心」，但成效必然有所不足（于坪，1965年11月19日：第696期第3版）。

承接上文的分析，這段時期的《周報》的確刊登了不少作者們埋怨自己未能親身接觸中國的鄉土地貌的文章。

另一篇名為〈我愛中國山水〉的文章，作者指出自己因為閱讀徐志摩的詩作而對中國的山水地理產生興趣，並感慨不能親自目睹這些風景。作者慨嘆「這些山啊水啊，應該屬於每一個中國人。可惜的很；今天的我們不能接觸自己的土地，不能親睹美麗的河山；東嶽泰山，與美國的落磯山一樣，都距離我們很遠」（黃智枝，1968年11月29日：第854期第7版）。

另一位自稱在香港土生土長的青年學生亦書寫文章並投稿至《周報》，抒發自己未曾親身接觸中國鄉土的抑鬱情感，作者表示只能以幻想來滿足自己因未能親身遊覽中國各地名勝古蹟的遺憾，該文章描述：「觸動我的愁意與及憶念、夢幻。長江、黃河、興安嶺、西湖，很多地方我都未看過，真的，讓我看看，讓我走在那些土地上，緬懷億萬年前的秋天。我長大的地方是這裏，但我渴望那裏，一切唯在夢中！」（白雲，1967年3月10日：第764期第8版）可見，兩位作者均對於不能夠親自遊歷屬於中國人的中國名山大川而感到「耿耿於懷」。

更有作者投稿《周報》，描述自己只能透過母親生活在鄉間的回憶記錄來建構他的「故鄉想像」。該文作者形容自己只能透過拼湊母親言談期間講述在中國大陸鄉間的生活片段，從而幻想自身曾經生活在大陸家鄉，並拼湊幻想出一些大陸家鄉畫面及圖像，藉此來滿足自己的對於生活在大陸鄉間的欲望。作者在文中幻想道：

故鄉該是風和日麗，山明水秀的江南！幻想啊，我沿着西湖邊漫行，在橙黃橘綠的果林中奔跑，撿起那些掉下來的熟透了的果子，嘻哈着往嘴裏送。這是一個小小的孩子對於他的故園所能構成的夢！（蓬草，1965年5月14日：第669期第7版）

至1970年代初，新一代香港的青年人更缺乏對於中國鄉土的認識以及情感，不少年輕人更因此而拒絕接受中國人的身份。當時《周報》曾刊登了一篇由青年學生書寫的文章，該文作者反映當代的香港青年對於只能夠透過書本學習「歷史中國」以及「地理中國」，因而對「真實的中國」感到十分陌生，亦不能驅使她對於中國產生認同感，並質疑自己能否歸屬成為中國人。她形容「中國對我不是一個回憶，也不是一件新的事物，它祇是一個個模糊又極之模糊的意象」，作者質疑自身在欠缺中國大陸生活的經歷和欠缺對現實中國的認識之下，自己還不可以自稱為一個中國人的身份（凌杞若，1970年1月2日：第911期第3版）。

另一位自稱為香港中文大學學生的文章作者也有相近的看法。她的文章描述當代香港青年人對於中國出現了「情感疏離」的現象，由於當代的香港青年人欠缺了對中國鄉土的地域歸屬感和認同感，故此難以產生中國人身份認同意識，不少新一代的香港青年甚至拒絕認同自身的中國人身份。她的文章形容：

在此時此地，我們不能否認我們是需要向一個地域或者文化認同的。但中國人的地域觀念一向甚重，比喻在香港出世並且受教育的人；他們在地域環境下是什麼人呢，而在文化上又應該是什麼人呢？我自己感覺到：他們對中國土地是沒有感情的，他們實際上沒有在中國土地居留的認同。（方琪，1970年1月2日：第911期第3版）

總括而言，1960年代中後期起，《周報》所刊登的不少文章當中，充分反映着新一代香港的年輕人在缺乏親身生活在中國鄉間的回憶之下，難以建立對於中國大陸社會的「鄉土意識」。而在缺乏「鄉土意識」的情況下，香港青年人對於中國的認識及情感變得模糊及淺薄，亦因此而削弱甚至消滅了新一代香港青年人的中國人身份認同意識。

三 香港意識的出現：《周報》與香港人身份認同

進入1960年代，由於中國大陸的政局動盪，先後發生大饑荒及「文化大革命」等重大事件，引致中港之間的人口以至文化交流接近完全中斷，香港的社會大眾無法像以往般在中港兩地之間不斷自由往返。麥高登、呂大樂等指出香港自1842年開埠以來，由於與中國大陸不設審查邊境的關係，令中港人民可以自由流動，並因此而驅使香港華人維持關注中國政局及認同中國人身份意識，但1949年中共建政後，中港實行邊界審查，兩地人民因此不再自由流動，因而產生了巨大的隔膜，香港新一代青年對中國社會的關注及認同感亦逐漸減少，取而代之的是1960-1970年代崛起的香港人身份認同意識 (Mathews, Ma & Lui, 2008: pp.10-11)。另一方面，香港社會經濟不斷發展，港英政府又適時提供切合民眾需要的政策，包括廉租屋政策、免費教育政策等等，增加了香港居民對於香港的認同感。適逢「六七暴動」等社會動亂事件的發生，港英政府更積極思考推行新的政策以提升市民對於香港的歸屬感 (Carroll, 2007: pp.158-160)。

李祖喬則指出香港民眾在1960-1970年代因為自身直接接觸或透過媒體間接吸收大量關於中國文化大革命及香港「六七暴動」的負面資訊，亦驅使當代香港民眾重新想像香港人的身

份認同，排拒中共及香港左派，甚至抗拒認同中國人的身份（李祖喬，2018 年秋/冬季：頁 5-16）。在中港兩地政治社會局勢不斷劇變的情況下，謝均才形容香港社會的「本土意識」逐漸建構起來，社會大眾開始對香港本土社會產生認同感（謝均才主編，2002：頁 27）。

更重要的是，1960-1970 年代香港的流行文化產品，包括香港無綫電視的電視劇、李小龍的功夫電影、粵語流行歌等相繼誕生以及風行亞洲甚至全球市場，導致更多香港民眾因為接觸這些由本土生產的流行文化而對香港社會產生自豪感，繼而出現「香港是我家」的概念。林泉忠更形容這時期是「香港共同體」形成的重要階段時期（林泉忠，2019：頁 19）。至 1970 年代初香港民眾普遍已經增強了對香港社會的認同及歸屬感，香港本土意識及香港人身份認同意識的論述已經形成（呂大樂，2012：頁 17）。

在「六七暴動」發生的時期，《周報》一群編輯和讀者發起了名為「壹元運動」的行動，呼籲大眾每人捐款一元予沒有參與罷工的工人，以答謝他們堅持為「香港的中國人服務」及表揚他們的「真正愛國情操」（陸離等，1967 年 6 月 30 日：第 780 期第 1 版）。繼而不少讀者亦投稿往《周報》，批判「左派」在鼓動民眾參與「暴動」，並壟斷了中國人身份認同意識的話語權。當時《周報》上有一篇名為〈洋奴、理智、情感〉的文章，作者批評香港「左派」組織以「做一個有血性的中國人」等具中國民族主義意識的口號吸引民眾參與「暴動」，質疑是「誤用」了中國人這概念，呼籲香港大眾「想一想，搞暴動，燒汽車，唸毛語錄是一個有血性的中國人所應為的嗎？」（雁，1967 年 6 月 2 日：第 776 期第 3 版）

題為〈是誰縱容了「帝國主義」？〉的文章則指出，「六七暴動」是「左派」刻意「把一場勞資糾紛」提升為「具有民族主

義及濃厚政治色彩的暴動」，故此該文呼籲香港民眾不要盲目接受左派以民族意識的宣傳而參與「暴動」（清曉，1967年6月30日：第780期第3版）。更有青年書寫文章反駁「左派」指控港英政府是「帝國主義者」，因而欠缺管治香港的合法性的說法。該文章直接指稱港英政府獲得居於「香港四百萬居民」的支持，作者形容是「香港四百萬居民願意住下來這一行動有力地表示了願與港英政府相處的意願」，故此該文章認為當時大部分香港人願意留港生活，即代表港英政府獲得了大部分香港人以行動授權港英政府管治香港的合法性，並要求「左派」不要再使用「帝國主義」等口號攻擊港英政府（于堅，1967年6月2日：第776期第10版）。可見當時《周報》的讀者們一面倒批評「左派」濫用民族主義意識並煽動香港民眾參與「六七暴動」，迫使香港民眾在支持中共或港英之間作出抉擇，令到更多的香港民眾支持港英政府的統治。

《周報》在「六七暴動」完結後，亦持續刊登了很多表達喜歡和認同香港社會的文章，改變了一直以來《周報》較多刊登從批判角度論述香港社會文化的文章的習慣。一篇名為〈我愛香港〉的文章，作者指出自己對香港社會充滿愛意及認同，作者形容「我從小便對香港發生濃厚的興趣，記得當我年少的時候，我總愛在夜靜的晚上，眺望遙遠的九龍半島，從她發出來閃閃爍爍的燈光，我靜靜的告訴你，從那時起，我便愛她了」。該文章又認為香港的地理風景、歷史文物非常豐富及美麗，故此她非常熱愛香港的山水、歷史文化及香港社會（野草，1967年9月15日：第791期第8版）。

另一篇名為〈香港吾愛〉的文章，作者是一位留學於加拿大的香港學生，她從新聞報道中看到「六七暴動」的消息，勾起了她對香港的思念，她書寫的文章多次強調「我愛香港的意識」，作者又認為自己是「屬於香港，而不是加拿大」，並呼籲

香港的青年要珍愛香港，作者呼喊：「愛她吧！香港，吾愛，香港，吾愛。」（嵐嵐，1967年9月15日：第791期第7版）也有文章把香港比喻為屬於民眾的巨人，認為香港這個巨人因「六七暴動」而受傷，但不會破壞香港民眾的日常生活及喜愛香港的決心，甚至從「香港多種報紙突然暢銷起來」可以得知「暴動」令大部分香港人更關心香港的發展，故此作者對香港社會的未來充滿信心及希望（王敬義，1967年9月15日：第791期第4版）。總括而言，以上各篇文章的論述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作者們均強調自己和社會大眾是歸屬於香港，對香港社會產生出濃厚的情感。

在這種社會思潮之下，《周報》亦刊登越來越多認同香港社會和文化的文章。《周報》的編輯們更舉辦了以「香港風情」為主題的徵文企劃，期望「作者都來把他對香港的愛、恨寫下，深入地把香港的真像從各種不同的角度表現出來」（編者，1968年1月26日：第810期第6版）。在這個徵文企劃裏，《周報》所刊登的大部分文章均表達了對香港社會的正面情感。其中一位投稿作者強調自己非常熱愛香港島的街道景色，亦因此而愛上香港這個城市，作者感嘆「香港是一個十分美麗的城，你說。是的，是的，我愛港島」（張愛倫，1968年2月2日：第811期第6版）。另一位投稿作者則讚美香港高樓大廈的建築群，形容為「十分熱鬧、喧喧嘩嘩」，非常美觀和吸引，並認為香港街道的風景別具特色。作者描述「從遠處看去，市還閃着光，映亮了一隅天，車子盪着，市遠着」（蒹葭，1968年2月2日：第811期第6版）。總括而言，這些文章的敘事結構均從描寫香港美麗的風景作為切入點，繼而描繪出香港具有值得人們喜愛的地方，並希望香港人能夠重新審視香港這個地方，對香港社會產生歸屬感和認同意識。

至1969年，港英政府為了增加大眾對香港的認同，開創

了「香港節」活動，透過舉辦一連串推廣香港社會的活動及嘉年華展示香港的社會文化，希望提升民眾對香港的歸屬感，以穩定殖民管治（謝均才，2002：頁13）。小思（盧瑋鑾）曾撰文評論「香港節」，她認為「香港節」是在「平淡的日子有些去處，讓好熱鬧的人，東跑跑、西看看，在彩色繽紛中團團轉」，「香港節」亦把香港描述成可以讓人「安居樂業」的地方並展示予大眾，她形容：

（香港）她是漸漸美麗起來的。戰後二十多年來，無數本來不屬於她、本來不愛她的人為了不能回歸本來所屬的地方、不能把應有的感情精力獻給自己所愛的土地，才把所有慢慢轉移到這暫作居停的小島上來。於是，她繁榮了，變成我們安居之所。（小思，1969年12月19日：第909期第12版）

可見，「香港節」等活動有效地導引社會大眾對香港產生歸屬感，甚至驅使小思這一位原本具有濃厚中國人身份認同意識的青年人亦對香港社會產生認同感。

因此，在「香港本土意識」如此濃厚的氛圍下，這時期的《周報》也刊登了更多青年作者的文章，質疑中國人身份認同意識是否仍適合這個時代的香港年輕人。一位青年作者分析當代香港人的認同問題，他質疑主流社會以中國人作為文化及身份認同意識的論述。該文作者形容「生於一個在地理上與中國不可分割，但政治或文化上卻不完全受到中國所及的地方，你若說是歸屬於中國的，那麼除了你有中國血統，曉得讀與講中國語言外，又有甚麼事實足以支持你是必須歸依中國？」該文作者繼而指出中國人與香港人除了血緣及語言運用上有所關聯之外，當代香港人及中國人欠缺了在文化及政治上的交流，故此當代香港青年對中國人身份認同意識難以產生「共鳴感」，

當代青年應該歸屬成為香港人（陳國華，1970年1月2日：第911期第3版）。

另一位青年學生的投稿文章則指出自己對於中國的地理、歷史、文化等完全不感興趣，只視作為一般知識的看待。她形容自己對中國（包括國共兩黨政權）的國旗、國歌等政治象徵物「完全沒有產生感覺」，相反作者自身對於英國、香港政府產生更大的認同感。故此她質問「中國對我，不是一個回憶，也不是一件新的事物，它祇是一個個模糊又極之模糊的意象，所以我問：我是中國人嗎？」因此，作者拒絕承認自己為一位中國人（凌杞若，1970年1月2日：第911期第3版）。

更有學生撰文批評中國人身份認同是一種「霸權」意識。該文作者不滿部分在香港生活的中國人要求所有生活在香港的華人都需要認同自己是一名中國人，卻無視新一代對香港已經產生了深厚情感及認同的「現實」。作者指出「我們之中，不少在這小島上有着根深蒂固的精神依藉。它不單只是我們父母、以及我們這一輩的出生地，也是曾祖輩的聚居地。長久以來，我們一直在其文化氣息中成長，對它產生了深厚感情是自然的事的。我們對香港是偏袒的，愛護的，感情化了。」故此該文作者希望其他人亦能夠尊重每一個香港人都有身份認同上的自由，不要強行「否定別人」的認同取向（陳浩恩，1972年12月15日：第1065期第3版）。

總括而言，透過分析196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周報》上的文章，清晰地觀察到1960年代中期起香港青年人在身份認同意識上出現了重大的轉變取向。香港人身份認同意識逐漸取代中國人身份認同意識成為當代主流青年社群的認同取向，香港認同正在不斷萌生發展。當時仍然為中學生的洪清田接受《周報》的訪問，並分析1970年代香港青年的歸屬問題，他形容：

一九四九年至今，這二十一年間，新的一代剛好長成。這新的一代，在本港出生長大，受教育。他們的心態行為取向，與老一代有了很大的歧異，不再視香港為一旅邸。(吳平訪問，1971年5月8日：第929期第3版)

可見，即使在《周報》這份標榜中國人身份認同立場的刊物上，1960年代後期起卻刊登了不少提倡認同香港人身份意識的文章。這種趨勢顯示出1960-1970年代的新一代香港青年人在身份認同意識取向上出現了極大的改變趨勢。而《周報》亦受到香港人身份認同意識崛起所影響，《周報》所堅持的中國人身份認同的立場更受到新一代青年讀者們的質疑。

四 「兩個中國」的並立：《周報》上呈現的「兩個中國」認同意識的衝突

除了香港人身份認同意識的誕生外，在1960-1970年代香港青年的中國人身份認同意識亦緊隨着中國（包括台灣）的政治局勢變化而不斷改變。當時《周報》上刊登的文章亦反映了在國共政權都自稱為「中國」的情況下，「兩個中國」的出現如何導致新一代香港青年對於中國人身份認同意識感到「混亂」，對於歸屬哪一個「中國」而感到「迷惘」。同時，國共兩黨在1949年後便開展「外交戰爭」，兩黨都強調自身代表着「中國政權」的合法性，在聯合國席位及邦交國上展開爭奪（蔡東杰，2019：頁85-92）。而國民黨政權自遷台以來一直依靠「反攻大陸」³的論述維持其自稱「正統中國」的合法性依據。

3 反攻大陸是國民黨的政治宣傳口號。在國民黨遷台後，蔣介石一直謀求重返大陸執政，反攻大陸政策除了指向軍事層面外，國民黨政權亦積極在利用反攻大陸口號作為意識形態上爭取海外華人支持的工具。參考蘇瑞鏘（2008）：《超越黨籍、省籍與國籍：傅正與戰後臺灣民主運動》，新北：前衛出版社，頁126-127。

汪宏倫曾分析國民黨政權遷台後所面對的國族身份認同的矛盾和困境，他指出國民黨政權「一向以『自由中國』自居，國民政府的教化體制，也使得其中國認同得到充分的制度支撐」（王宏仁、李廣均、龔宜君編，2008：頁86）。但伴隨着時間的過去，國民黨政權仍未能成功「反攻大陸」。自1960年代起，「反攻大陸」論述在臺灣和海外華人社區逐漸失去了號召力，引致大量原本認同國民黨政權為「正統中國」的香港青年人感到失望。

同一時期，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在科技、軍事發展上取得一定成就，吸引了更多新一代的香港青年改為認同中共所代表的「中國」。至1970年代初，香港學生運動出現了重大的轉向，在釣魚台事件等社會運動影響下，青年學生社群出現了「認同轉向運動」，越來越多香港青年傾向認同以及支持中共政權，甚至出現支持中共政權的學生運動派系——「國粹派」。而支持「中華民國」的學生勢力卻顯得「花果凋零」（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1983：頁126-127）。可見在國共兩黨皆強調自身為「中國」的情況下，「中國人」這個身份認同意識變得混亂不清，很多當代香港的年輕人對於中國人身份認同意識感到混淆，更難以取得青年人的認同。

首先，國共兩黨皆自稱為中國，各自在香港等海外華人地區爭取認同和支持，導致不少當代香港青年人不知應該歸屬於哪一個「中國」。當時期的《周報》上不少的文章亦反映着對於「兩個中國」的疑惑。一位《周報》的青年作者形容自己「從小就知道自己是一個中國人」，對於中國的歷史及文化產生很大認同感。但在成長的過程中留意中國政治發展，卻出現國、共兩黨皆自稱為「中國」政權，導致他這位在香港出生成長，從未踏足過中國大陸和台灣土地的青年人感到十分困擾及迷惘。作者認為自己被中國所放棄，故此特意來稿《周報》，詢問自

身的身份認同取向。作者問道：「國家卻出現兩個對立的政權，何去何從，你能告訴我嗎？回國的話，有用得着我們的地方嗎？」作者表示對於「兩個中國」政權的並立感混淆，因此而產生出對中國人身份認同的質疑和不安的情緒（寒秀，1970年1月23日：第915期第3版）。

另一位青年讀者則致函到《周報》的「大孩子信箱」專欄，控訴自己被「中國國籍」問題所困擾。該文作者認為在「兩個中國」並存的情況下，導致原本認同自身為中國人的作者感到十分困惑。作者更因此而對香港及英國產生認同感，產生加入英籍的念頭。而「大孩子」在回覆該文作者時也表示認同其觀點，「大孩子」形容「關於身份證國籍問題，如果是中國籍的，現在中共不來承認我們，台灣也不來承認我們」，最後「大孩子」悲哀地指出當代香港青年人正受到「兩個中國」政權的「排斥」，被排拒成為中國人（大孩子，1972年2月11日：第1021期第5版）。

更有一位作者的文章描述自己家庭的父母及兄弟姊妹五個人，因分別認同中共及國民黨所代表的中國而產生「爭拗」。作者的其中一個弟弟認同中共所代表的中國，這位弟弟認為中共發射人造衛星上太空是「中國人的驕傲」。但另一位弟弟卻傾向認同國民黨政權所代表的「中國」，並批評中共耗費大量人力財力製造人造衛星是「中國的悲劇」。兩人因此而吵架不斷，作者最後為平息衝突，只好說道：「我們都愛中國，愛中國的原子彈人造衛星，我們更愛褲子、白飯與自由。」這篇文章充分顯示出1960-1970年國共政權鬥爭下產生出「兩個中國」的身份認同意識的歸屬問題。當代香港的青年人普遍對於出現「兩個中國」政權感到「困惑」及「無奈」（小椰，1970年5月15日：第930期第3版）。

另一方面，在1950-1960年代中期以前，《周報》所刊登

的大部分文章裏均視國民黨政權為「中國」、「祖國」的象徵。例如當時仍為新亞書院學生的小思，在前往台灣交流時以「祖國」稱謂台灣，形容自己是回到「另一個祖國去」（小思，1963年11月22日：第592期第3版）。她又指出不少自1949年後逃離中國大陸的人，往往把對大陸故鄉思念之情寄託予台灣，對中華民國的國旗、國歌充滿溫情的敬意，視國民黨政權為「正統中國」的代表（小思，1964年1月10日：第599期第3版）。

可是，踏入1960年代中期，隨着時間的過去，國民黨政權仍然未能透過實質的軍事行動藉以重返中國大陸執政，相反呈現出安守台灣之勢。這種情況導致越來越多台灣以及海外的華人相信國民黨已經無力反攻大陸的說法，形成了一股「反攻無望」的思潮。⁴ 這種思潮引致認同以及支持國民黨政權為「正統中國」的海外華人社群產生失落的情緒。

當時的《周報》裏亦刊登了不少呈現「反攻無望」意識的文章，反映着《周報》部分的青年讀者們對於國民黨政權的失望情緒。一位自稱為「踏上中學後便立下志願他日捨身反共報國」的青年人投稿《周報》，批評國民黨政權「不思進取」，沒有積極籌備反攻大陸，對國民黨非常失望，並辜負了一眾支持者。作者形容「十五年來的偏安，根本談不上富國強兵，安撫黎民，眼看敵人的勢力一天一天地增長，而他們還倒行逆施，那些政治家天天唱着動人的高調喊着反攻復國，但十五年了，十五年來他們的謊言，不知欺騙了多少無知的青年，粉碎了多少無知者的美夢」。作者因此而對中國的前景感到十分灰心，

4 在1957年，台灣政治異見學者殷海光發表〈反攻大陸問題〉一文，質疑國民黨政權能否在短時期內重回大陸執政，他形容「馬上就要回到大陸這一假想又是頗為渺茫」。參考殷海光：〈反攻大陸問題〉，載殷海光（1990）：《政治與社會（上）》，台北：桂冠圖書公司，頁519-520。

又認為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已經沒有希望，對於自身作為中國人感到「無奈」（林鋒，1965年6月11日：第673期第3版）。

另一位青年人則致函《周報》，形容自己對於國民黨政權長年空喊「反攻大陸」卻沒有實質行動感到不滿及焦慮。該文作者指控國民黨政權沒有乘着中共推行文化大革命的機遇作軍事反攻，害怕自己「就要如此永遠過着流亡的生活，托祐在人家的屋簷下混一口飯吃」，並憂慮中國的政治前景使海外的中國人永遠流亡異鄉（思敏，1968年10月11日：第847期第3版）。在國民黨政權「反攻大陸」無望的氛圍下，更有香港青年向《周報》的編輯表示因為國民黨政權「反攻大陸」無望，因而對於中國及自己的未來均感到絕望。該文作者認為這時代的香港青年就像棄嬰般被「祖國」所拋棄，作者感嘆「祖國經已遠離了我」，又指自己「就像一個嬰兒，由於上一代的不爭氣，這輩孩童是被摒棄於祖國這個大家族門外」（新編，1965年5月14日：第669期第7版）。可見，因為國民黨政權長期未能重返大陸執政所產生的失望情緒及氛圍影響之下，原本認同國民黨政權為「正統中國」象徵的香港青年人亦逐漸對於中國人身份認同感到失望。

當國民黨政權呈現「江河日下」之勢，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卻在軍事、外交及科技上產出了明顯的成就。包括分別在1964年及1967年成功自行研製核彈及氫彈，又在1970年起成功試射多枚自製的人造衛星，更在1971年成功加入聯合國、甚至取代中華民國（國民黨政權）在安全理事會當中所擔任的常任理事國席位等成就（徐中約著，鄭會欣等譯，2002：頁739-759）。中共亦因此而爭取了不少當代香港青年人的支持，甚至改為擁護中共所代表的「中國」。在1971年初，一位中五學生冼偉麒以〈為中共辯一辯〉為題投稿至《周報》，批評

《周報》所刊登的不少文章當中帶有的反共政治意識形態。該文作者認為中共帶領中國成功抗衡美國及蘇聯兩個霸權大國，並成功製造出核彈，值得所有中國人的支持。作者又為中國建政以來所推行的政策如三反五反、文革等進行辯護，表達支持中共政權的意識。作者最後表示：「總之，無論中共用什麼手段，是正確或是錯誤，但它的目的是要中國站起來。要成功，就要犧牲，要中國強壯，中國人民受苦總是免不了。」（冼偉麒，1971年2月19日：第970期第5版）

出乎意料，《周報》竟然接收了大批讀者們投稿至《周報》支持這位作者觀點的文章，其中包括一位青年學生盛讚中共執政以後中國大陸變得強大，該文作者認為「無論中共用什麼手段，它的目的是要中國在世界上站起來爭取地位」（草草，1971年3月5日：第972期第4版）。另一位學生則投稿《周報》為中共發動文革而辯護，該文章認為中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中國踏進「現代化」的必要過程，故此該文作者表態支持中共發動文化大革命以改革落後守舊的中國社會（一個讀工程的學生，1971年3月26日：第975期第3版）。

當〈為中共辯一辯〉一文所引起的討論完結後，《周報》仍然持續刊登若干篇支持中共政權的文章。至1972年時任美國總統尼克遜（Richard Nixon, 1913-1994）歷史性訪問中國大陸，中共藉着把這場訪問塑造成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史上的一場「勝利」，中共獲得了「美國以往沒有給予過中國的認同及尊敬」（Bickers, 2017: p.361）。中共把尼克遜訪華一事包裝成為中共獲得了外交勝利的象徵，成功吸引了若干香港青年的支持並轉移認同中共政權。一篇名為〈我們在製造歷史〉的文章，作者因為在電視上看到美國總統尼克遜到訪中國，看見美國總統與中共領導人「並排而行」、中國及美國的國旗共同升起而感動，作者形為這是近代中國的歷史性時刻，形容「我們這一代，就

像從前的人，分分秒秒在製造歷史」，因此而認同中共帶領的中國政府（嘉倫，1972年3月3日：第1024期第7版）。另有文章作者不滿《周報》刊登很多「不理性地批判中共施政」的文章，認為他們並非「站在中國人的立場」攻擊中共，沒有「考慮中國利益」，要求其他《周報》的文章作者進行反思（陳康，1972年10月6日：第1055期第3版）。

可見，踏入1970年代，隨着中共在軍事、外交、科技等方面的發展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成就後，中共亦成功爭取了不少當代香港青年人的支持及認同。甚至在《周報》這份在政治意識形態上標榜反共的刊物中，竟然出現不少支持及認同中共政權的文章，便能理解到這股中國人身份認同意識的轉向思潮所產生的影響力是何等強大。當代的主流香港青年亦由認同國民黨政權所代表的「中國」轉變為認同中共所代表的「中國」。

五 總結

綜合分析1960-1970年代《周報》上的文章，理解到政治及社會局勢的轉變如何影響人們的身份認同。陳清僑指出1960-1970年代是香港社會的「特殊歷史過渡期」，社會大眾由1950年代抱着「移居香港為勢所迫的生活需求」的難民心態，漸漸因政治、社會等因素改變為1970年代「以此地為家」的居民心態（朱耀偉主編，2016：頁60-65）。關信基則解釋港英政府自1950年代末期一改自開埠以來「不干預」的統治方式，增加大量資源於教育、房屋等社會福利項目，關信基認為港英政府新的管治方針改變了以往香港人自視為「過客」的心態，增強民眾對香港的歸屬感，更形容1960年代末期起「香港社會與政權的關係已不復舊觀」，香港的本土社會意識漸漸萌芽（劉青峰、關小春主編，1998：頁102-105）。

再者，《周報》的「中國人」身份認同亦因為國民黨政權逐漸失去代表「中國」的合法性，以及中共在科技及外交上的發展成就等因素令中共所代表的「中國」認受性提升，導致不少當代的香港青年認同其代表的「中國」政權。傅葆石認為 1970 年代初美國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修好，《周報》因而在民族身份認同上「走向迷失」，與當代香港青年「失去連結」（傅葆石，2019 年 6 月：頁 47）。更重要，不單只是香港青年人，即使是海外華人以至著名的華裔學者如歷史學者何柄棣（1917-2012）等亦因為 1960-1970 年代中共帶領中國進身「核子大國」行列，以及成功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中的中國代表席位，因而對中共產生「強烈幻想」，期望中共能夠把「中國帶往安定、富強的方向，擺脫國家積弱的歷史印象」，故此轉移支持中共政權（趙善軒，2018 年春/夏季：頁 165-196）。傅葆石更認為《周報》未能適應 1960-1970 年代香港「一段躁動不安的轉折期」，未能在六七暴動、工業化及本土化後的香港社會裏尋找新定位，故此被香港新一代青年人所淘汰（傅葆石，2019 年 8 月：頁 78-79）。這種政治認同的轉變亦導致《周報》所推崇的、象徵「傳統、自由」的中國人身份認同意識失去對香港青年人的號召力。

因此，《周報》在身份認同意識上與 1960-1970 年代的香港主流青年社群越走越遠，因而失去了大量讀者，令銷量急速下跌，繼而停刊收場。根據曾任《周報》編輯的吳平記述，《周報》銷量由他剛進入時（1960 年代初）的每期約二萬五千份，暴跌至 1971 年每期銷量不足一萬份，令到《周報》出現經營困難（吳平，1988 年 10 月 15 日：頁 146）。而導致《周報》流失大批讀者的原因，相信與《周報》持續堅持其中國人身份認同的立場有關，就如同羅永生分析唐君毅等「新儒家」學派及《周報》等「右派」人士及機構雖然主導了 1950-1960 年代的香港社會文化思潮，但由於「他們沉醉於宣揚反共及傳統中華文化意

識，使他們與香港社會疏離」，未能跟隨 1960-1970 年代香港社會思潮轉向的步伐，因而失去了在香港社會上的文化主導地位（羅永生，2015：頁 185）。可見，《周報》的銷量下跌更是反映着香港新一代青年人對於傳統中國文化以及台灣國民黨政權所代表的「中國」的認同情感逐漸消失，香港的「右派」勢力亦逐漸失去香港社會大眾的支持。

另一方面，在香港人身份認同意識崛起的時侯，《周報》卻仍然堅持關注其中國人身份認同意識的立場，令到不少認同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讀者感到不滿，包括原為《周報》讀者及作者的崑南，他明言因為不滿《周報》以「中國學生」為刊物的出版宗旨，忽略了「香港學生」的立場，故此特意在 1967 年創辦《香港青年周報》，以香港作為刊物的主體，宣揚「香港意識」（陳冠中，2012：頁 165）。《香港青年周報》成為《周報》的競爭對手，羅卡指出《香港青年周報》針對《周報》在討論香港電影、音樂等流行文化方面的不足，對《周報》造成重大的威脅。《香港青年周報》的誕生亦顯示出部分當代香港青年不滿《周報》對於正在冒起的香港人身份認同意識採取忽視、無視的態度（盧瑋鑾、熊志琴編著，2017：頁 60-62）。

而且，《周報》仍然支持漸失代表性的國民黨政權，亦違背了當時越來越多香港青年人支持中共政權的大趨勢（羅永生，2014，頁 74-75）。在這種社會思潮影響下，《周報》亦因此而失去更多的讀者。資深讀者陳文鴻分析《周報》的立場跟不上中國的政治形勢發展，他認為《周報》因為未能跟隨時代意識，改為認同中共政權，使《周報》進入「失語」的狀態，他形容「香港學生運動越來越政治化，也越來越正面面對中國大陸的政治現實，整個社會思想的發展，以至青年知識份子的次文化思想都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作為解放前文化傳統代表的《周報》，既不能變，亦不會變，使只有倒閉的一個途徑。」（陳

文鴻，1988年10月15日：頁120)

最後，適逢美國與中共在1970年代初關係破冰，美國政府減少了對全球反中共機構及媒體的財政援助，令到原本獲得美國亞洲基金會資助的友聯研究所及《周報》失去部分財政來源（盧瑋鑾、熊志琴編著，2017：頁136-138）。王梅香的研究更指出「亞洲基金會」在1950年代末起便改變原本全力支持各個援助項目的政策，改為鼓勵各援助機構在財政上達致「自給自足」，自行尋求能夠在商業社會裏維持營運的方法，亦於1960年代中期起逐漸減少對各機構的援助金額（王梅香，2020年3月：頁149）。故此，《周報》在銷量不足和缺乏外來資助的情況下，友聯研究所亦只好停辦《周報》。

參考文獻

CHL：〈老讀友 CHL 君一封語重心長的來信〉，載《中國學生周報》，1971年2月12日。

一個讀工程的學生：〈為中共辯一辯讀後之八、九、十——八、從香港看中國〉，載《中國學生周報》，1971年3月26日。

于坪：〈談鄉土感情之生根〉，載《中國學生周報》，1965年11月19日。

于堅：〈是誰縱容了帝國主義？〉，載《中國學生周報》，1967年6月2日。

大孩子：〈楊根堂同學，你是中國學生周報救亡運動的第一個訂戶〉，載《中國學生周報》，1971年2月5日。

大孩子：〈來函及簡覆：挫折後的出路〉，載《中國學生周報》，1972年2月11日。

小思：〈國歌、白雲與國土〉，載《中國學生周報》，1963年11月22日。

小思：〈莫把斯湖當西湖〉，載《中國學生周報》，1964年1月10日。

小思：〈香港節中的杞人〉，載《中國學生周報》，1969年12月19日。

小椰：〈人造衛星上天·愛國青年的話〉，載《中國學生周報》，1970年5月15日。

方琪：〈我是香港人嗎？幾位大學生談「歸屬感」問題〉，載《中國學生周

- 報》，1970年1月2日。
- 王宏仁、李廣均、龔宜君編（2008）：《跨戒：流動與堅持的台灣社會》，台北：群學出版社。
- 王宏志、陳清僑、李小良（1997）：《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台北：麥田人文。
- 王梅香（2020年3月）：〈冷戰時期非政府組織的中介與介入：自由亞洲協會、亞洲基金會的東南亞文化宣傳（1951-1959）〉，載《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32卷1期，頁123-158。
- 王敬義：〈在香港看香港〉，載《中國學生周報》，1967年9月15日。
- 田邁修主編（1995）：《香港六十年代：身份，文化認同與設計》，香港：香港藝術中心。
- 白雲：〈讀吹過鄉土的秋風有感〉，載《中國學生周報》，1967年3月10日。
- 朱耀偉主編（2016）：《香港研究作為方法》，香港：中華書局。
- 余英時：〈負起時代責任！〉，載《中國學生周報》，1952年7月25日。
- 余英時（2018）：《余英時回憶錄》，台北：允晨叢刊。
- 吳平：〈《周報》的回憶〉，載《博益月刊》，1988年10月15日，第14期，頁145-147。
- 吳平訪問：〈新形勢，老問題〉，載《中國學生周報》，1971年5月8日。
- 吳俊雄、張志偉編（2002）：《閱讀香港普及文化 1970-2000》，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呂大樂（2007）：《四代香港人》，香港：進一步出版社。
- 呂大樂（2012）：《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香港：中華書局。
- 李祖喬（2018年秋/冬季）：〈冤魂社會：香港作為中國的異托邦〉，載《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總第52期，頁5-18。
- 洗偉麒：〈為中共辯一辯〉，載《中國學生周報》，1971年2月19日。
- 林泉忠（2019）：《當「崛起中國」遇上「太陽傘」——透視廿一世紀兩岸三地新關係》，香港：明報出版社。
- 林鋒：〈何處是神州〉，載《中國學生周報》，1965年6月11日。
- 思敏：〈春天還會遠嗎？〉，載《中國學生周報》，1968年10月11日。
- 若夢：〈秋晚〉，載《中國學生周報》，1956年12月21日。
- 香港出版學會編著（2018）：《書山有路：香港出版人口述歷史》，香港：香港出版學會有限公司。
-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1983）：《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香港：廣角鏡出版社。

- 凌杞若：〈我是中國人嗎？〉，載《中國學生周報》，1970年1月2日。
- 徐中約著，鄭會欣等譯（2002）：《中國近代史（下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殷海光（1990）：《政治與社會（上）》，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 海竹：〈秋故鄉的憶念晚〉，載《中國學生周報》，1958年1月24日。
- 草草：〈「為中共辯一辯讀後之四——也為中共辯一辯」〉，載《中國學生周報》，1971年3月5日。
- 堅貞：〈懷念〉，載《中國學生周報》，1958年5月23日。
- 張愛倫：〈港島·我愛〉，載《中國學生周報》，1968年2月2日。
- 清曉：〈洋奴、理智、情感〉，載《中國學生周報》，1967年6月30日。
- 野草：〈我愛香港〉，載《中國學生周報》，1967年9月15日。
- 陳文鴻：〈落後於社會變遷——談《周報》的「政治觀」〉，載《博益月刊》，1988年10月15日，第14期，頁119-121。
- 陳明鈺、鮑紹霖、麥勁生、區志堅合編（2018）：《中國與世界之多元歷史探論》，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 陳冠中（2012）：《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陳浩恩：〈請讓每一個人都有選擇的權利〉，載《中國學生周報》，1972年12月15日。
- 陳國華：〈何處是吾家？〉，載《中國學生周報》，1970年1月2日。
- 陳康：〈請冷靜地想一想，這對國家有益處嗎？〉，載《中國學生周報》，1972年10月6日。
- 陸離：〈請把這個秘密傳揚開去……〉，載《中國學生周報》，1971年1月15日。
- 陸離等：〈壹元運動！〉，載《中國學生周報》，1967年6月30日。
- 傅葆石：〈文化冷戰在香港：《中國學生周報》與亞洲基金會，1950-1970（上）〉，載《二十一世紀》，2019年6月，第173期，頁47-62。
- 傅葆石：〈文化冷戰在香港：《中國學生周報》與亞洲基金會，1950-1970（下）〉，載《二十一世紀》，2019年8月，第174期，頁67-82。
- 寒秀：〈我們沒有真正被需要的感覺！〉，載《中國學生周報》，1970年1月23日。
- 嵐嵐：〈香港吾愛〉，載《中國學生周報》，1967年9月15日。
- 彭小妍編（2013）：《文化翻譯與文本脈絡：晚明以降的中國、日本與西方》，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 雁：〈「做一個有血性的中國人」〉，載《中國學生周報》，1967年6月2日。
馮品佳主編（2004）：《通識人文十一講》，台北：麥田出版。
- 黃子程訪問：〈《周報》社長——陳特漫談周報歷史〉，載《博益月刊》，1988年10月15日，第14期，頁125-131。
- 黃智枝：〈我愛中國山水感〉，載《中國學生周報》，1968年11月29日。
新編：〈我很悲哀！〉，載《中國學生周報》，1965年5月14日。
嘉倫：〈我們在製造歷史〉，載《中國學生周報》，1972年3月3日。
兼荻：〈市〉，載《中國學生周報》，1968年2月2日。
- 趙善軒（2018年春/夏季）：〈何炳棣與中研院斷交考：兼論海外華人的政治認同轉向〉，載《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總第51期，頁3-37。
- 劉青峰、關小春主編（1998）：《轉化中的香港：身分與秩序的再尋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編者：〈香港風情引代編後〉，載《中國學生周報》，1968年1月26日。
蓬草：〈家園何處？〉，載《中國學生周報》，1965年5月14日。
蔡東杰（2019）：《冷戰、霸權秩序與兩岸外交》，台北：暖暖書屋。
蔡榮芳（2001）：《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鄭宏泰、黃紹倫（2018）：《香港身份證透視（第二版）》，香港：三聯書店。
學壇：〈堂堂的做一個中國人〉，載《中國學生周報》，1957年5月24日。
盧瑋鑾（1996）：《香港故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盧瑋鑾、熊志琴編著（2016）：《香港文化眾聲道1》，香港：三聯書店。
盧瑋鑾、熊志琴編著（2017）：《香港文化眾聲道2》，香港：三聯書店。
謝均才主編（2002）：《我們的地方，我們的時間：香港社會新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羅永生（2014）：《殖民國國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羅永生（2015）：《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蘇瑞鏘（2008）：《超越黨籍、省籍與國籍：傅正與戰後臺灣民主運動》，新北：前衛出版社。
- Robert A. Bickers (2017), *Out of China: How the Chinese Ended the Era of Western Domination*.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John M. Carroll (2007), *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Jonathan Rutherford (Ed.) (1990),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龐浩賢

Mathews, Gordon, Ma, Kit-wai and Lui, Tai-lok (2008), *Hong Kong, China: Learning to belong to a natio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